

徐崇温 自选集

北 / 京 / 著 / 名

学 / 者 / 文 / 集

重庆出版社 ▲

北 / 京 / 著 / 名 / 学 / 者 / 文 / 集

徐崇温 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



作者像

作者小传

徐崇温，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52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1956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副博士研究生。历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哲学学部主任并兼任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1991年7月起获政府特殊津贴。有多部著作出版。

学术自传

开拓 探索 阐发

——我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三项研究

四十多年来,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开拓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是探索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三是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一、开拓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四十多年来我所从事的一些专业中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反响最大的,要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这个专业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这几位所领导都说没有听说过这种思潮,没法搞。当时在场的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杜任

之因在我以前的书稿中见到过有关论述,就把这项任务替我接了过来。几个月后,在我完成的材料得到乔木的好评以后,哲学所科研处要我在小范围内讲讲“西马”情况,消息传到院外,先是中联部西欧局邀我去讲葛兰西,接着是教育部邀我去上海、哈尔滨等地给全国高等院校政治教师暑期讲习班讲“西马”,从此以后,几十所高校、党校、部队院校和讲习班、研讨班邀我去讲“西马”的,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研究“西马”逐渐由临时任务成了我长期性的研究专业。

经过研究——讲课——再研究——再讲课的多次循环,我于1982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近50万字的专著。

这部专著,首先是在适应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向我国读者系统地介绍半个多世纪以来,“西马”产生、发展情况和基本内容的书,在正文12章中,除第一章讲被1968年“五月风暴”推到历史前台的“西马”的一般情况外,其他的11章分述“西马”各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和活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各派的基本理论和它提出的有吸引力的新观点。

但是,这本专著的宗旨,又不是要对“西马”作纯客观主义的介绍,而是要对它的思想内容和客观作用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评价,并吸取其中一切可供我们参考的有价值的因素和思想资料。

我认为,“西马”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在性质上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一思潮的许多代表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却从一开始就用西方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由此形成“西马”形形色色的不同流派,并以此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抗衡;另一方面,“西马”

又冲破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的种种缺陷和弊端。显然,问题的前一个方面,使我们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而问题的后一个方面,则使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所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

我对“西马”的这种看法,既区别于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西马”说成是“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又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把“西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哲学学术动态》相继发表书评,称赞本书的优点,突出它不同于外国学者的对“西马”的评价,1983年1期《新华文摘》则摘载了该书第1章;

(二)1985年10月,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把它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

(三)1987年第51期《瞭望》杂志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高阳《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一文,希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较为熟悉和鄙薄的人都来读这本书,以便进行比较和鉴别;

(四)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26期发表鲁凡之的文章,说本书“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最系统而完整的一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中文著作”;

(五)在台湾,本书在被谷风出版社排成繁体字版本出版以后,又被其他一些书商多版翻印。《中国论坛》第359期发

表的潘光哲的文章就此写道：“在台湾，大陆的优秀作品颇能引起共鸣，当然也就造成一书数版的现象，如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曾在台北知识界带来一阵风潮，各种地下版‘群雄并起’”；

（六）本书出版以后，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各流派代表人物思想理论的介绍和评述，开始广泛进入我国哲学、政治学、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专著、百科全书和辞典中，其中有许多著作公开引用本书的论述，更多的则不指名地运用本书的论述；

（七）1992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除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辞条介绍该思潮的内容外，还专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辞条，介绍本书的内容，并评价本书“着重于原著的引证与重要概念的分析，既有综合性的论证，也有分析性的阐明，并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作适当的批判，该书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著作之一”；

（八）1988年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该刊记者陈其矩的采访文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徐崇温谈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报导了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九）1988年12月5日，英文版《中国日报》以四分之一版的篇幅，发表题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看法》的文章，把《求是》杂志的上述文章，摘译成英文对外报导；

（十）1993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该报记者阳妮的采访文章《中国‘西马’第一人和他的丛书》，说本书作者“堪称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

（十一）1993年12月，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和哲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去“结合”马克思主义,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又展开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剖析,这可以说是我研究“西马”思潮的第二个阶段。在这方面,除《法兰克福学派述评》一书早在1980年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并在1988年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本外,在1982年以后的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又先后发表了几项专题研究成果:

在“西马”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方面,我发表了《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合著)和《存在主义哲学》(主编、合著)和《卡缪的荒谬哲学》(合著),并开展了对萨特以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的科学技术观、后工业革命观的研究。这些研究,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一书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反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7年第4期发表唐合俭等的文章,说本书“自始至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评述存在主义哲学,的确称得起对存在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台湾《东海哲学研究集刊》第1辑发表的蒋年丰的《沙特,在大陆》一文,则说本书“对沙特从《存在与虚无》到《辩证理性批判》的思想转变以及这个转变与梅洛—庞帝之间的纠结有着极为宝贵的誉理,尤其可贵的是徐先生还介绍了尚未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第2卷的内容,其步伐已赶上欧美”,“这些学术成就绝非台湾学界所能望其项背的”。

在“西马”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方面,我发表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书,并展开了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国家论的研究。对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书,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爱书人月报》1987年5月号说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一思潮的著述”,台湾谷风出版社在出版该书繁体字版

本时,推荐该书“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学术佳作”。

在研究“西马”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背景方面,我发表了评述科技革命的社会方面的专著《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该书曾获第一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日益频繁和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胜而在西方失败的情况下,在西方国家内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的战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张借助于现代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去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我国学术界从70年代末开始研究“西马”思潮的历史说明,当着我们党强调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我国学术界有些同志就倾向于接受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西马”说成是“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性质到作用把“西马”说得一无是处,予以否定;而当我们党强调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学术界有些同志就倾向于接受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把“西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看法,把“西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鼓吹多元论,而这样那样地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西马”思潮。所以,为了正确地认识“西马”的性质和作用,为了使“西马”研究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在两条战线上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西马”思潮的性质和作用。

倾向于全盘否定“西马”的同志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私货”,“在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而且“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起着消极作用”,“极大地损害着进步的革命运动”。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事实。这是因为,尽管“西马”有许多错误和失误,但它毕竟提出或者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略或者偏离的问题,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试图引进20世纪西方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并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弊端和缺陷。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探索中相继推出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也为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结合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极其丰富而重要的思想资料。所以,在我们对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西马”的研究,理应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然而,全盘否定“西马”的意见,相对地说,在我国学术界毕竟只占极少数;更加大量得多的意见则表现为对“西马”用西方唯心主义去“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属性视而不见或者估计不足,因而竭力主张把“西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鼓吹多元论观点。这种意见早在198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上,就有所表现,而从1988年开始,则爆发为一场历时数年、扩展到《人民日报》等十多家报刊杂志乃至海峡对岸的有关“西马”的讨论和论战。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有一种意见把“西马”实行的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我认为,这是在把两种不同类型的“结合”混淆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导致的是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而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并不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而且它还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有一种意见把“西马”实行的这种折衷混合,说成是“不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氛围中孤立出来”。我认为,这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主张广泛吸收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同马克思主义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而反对折衷主义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割裂了开来,用前者去否定后者了。“西马”发展的历史说明,实行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和教条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有一种意见借口在“西马”思潮中各派观点迥异,代表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倾向也不尽相同,因而反对给“西马”笼统定性。我认为,“西马”各派之间的差异性,同一个代表人物前后不同的倾向性等具体情节,并没有改变“西马”各派、各种不同倾向都用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个共性,而正是这个共性在决定着我们不能在“西马”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有些同志把葛兰西和卢卡奇的实践哲学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并以此作为在“西马”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的根据。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因为,由于葛兰西、卢卡奇都用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

“结合”马克思的实践观,这就使他们的实践哲学不能不成为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东西。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认为,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派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则回到了康德主义。这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就又重现了,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更高水平上进行综合仍然是必要的。葛兰西提出了高扬实践,恢复马克思强调实践作用的哲学世界观的综合方案,这个想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实际上,葛兰西高扬实践的动机却表现为主张把自然包摄在人类历史之下,归结为被人所支配和利用的对象,把客观事物溶解在人的实践中,强调要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去认识客观实在和物质,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认为外部自然界依存于人、依存于人的实践、是实践内部的对立的同一性中的一方的唯实践主义,据此他说“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世俗化和思想的世俗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线索”。

卢卡奇则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意识即实践,“意识的行为就推翻着它的对象的客观形成”,以及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的观点,卢卡奇提出和重申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卢卡奇的这个命题在集中注意力于考察作为物化历史的“第二自然”的时候,忘记了去考察“第一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在力求解决自然和历史的二分法的时候,干脆忘却了自然,在要求废除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时,完全否认了客观性的要求,这就使卢卡奇陷入到和实证主义唯心主义方向相反的、浪漫主义反自然主义的泥潭中去了。而把意识本身说成就是能改变对

象的实践,就更加唯心了。

正因为这样,葛兰西和卢卡奇就没有能够像他们主观上所希望的那样,纠正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歪曲,恢复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观,而是陷入到唯心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和唯实践主义中去,对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一个和机械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

事情正如卢卡奇在1971年会见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时所说的那样:“在20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经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留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我们都错了,今天如果搬出那个时期的著作,说他们在今天正确,那会是完全错误的”。

我认为,对于那些竭力把“西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于那些鼓吹“要想研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想发展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去深入研究卢卡奇的思想”,认为卢卡奇“开辟的道路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之路”的同志来说,重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这一段经验教训,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为了使我国学术界的广大同志,能够不是凭想象、凭主观上的好恶,而是根据客观事实、根据原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作用作出正确的判断,我在1988年以来,在积极参加“西马”的讨论和论战的同时,又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主编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1989年11本,1990年9本,1993年13本,1997年9本,……。在这套丛书中,属于“西马”各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著作之列的,有: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卷;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卡尔·马克思》;葛

兰西的《实践哲学》；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霍克海默尔的《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和《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和《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列斐弗尔的《论国家》；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莱斯的《自然的控制》；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威廉·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等等。属于我国学者对“西马”思潮的评析之列的，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西方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弗洛姆研究》；《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我对“西马”的研究，大体上说来，经历了以上三个不同的阶段。

在研究外国思潮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同样地应用到精神文明建设中，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一切外国思潮，在这种评析中抛弃有害的东西而汲取有益的东西，以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而决不能“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地，“一窝蜂地盲目推崇”。

在外国与中国的关系上，我认为，我们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并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去检查、验

证“西马”提出的某些理论是非。

例如,在“西马”人本主义各派中,曾经有许多人认为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设计太狭隘,以为在政治上夺取政权,在经济上把私有制改为公有制后,革命就算完成了。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应当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的理论观点,因为他们觉得,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个人远没有得到相应的全面解放,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常生活,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把具体问题恢复到它在集体性问题旁边所应得的地位,而重建社会主义同个人解放的同一性。怎样来判断和评价这种理论呢?

根据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西马”中有些人认为应当把日常生活批判放在社会变革的中心的看法,有其不妥当的一面,因为这反映出他们显然忽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改变国家政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依存性。事实是:要是国家政权还在资产阶级手里,要是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那末,无论对微观的日常生活进行怎样的批判,都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的。

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西马”的日常生活批评论,又确实提出和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遭到忽略的问题,确实触及了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缺陷。

把社会主义革命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从一切方面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曾经是列宁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为此他提出了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提出了“抓住日常问题的中心环节”、“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去的问

题。但在后来,把社会主义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却遭到了忽视,从而严重地压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并成为 90 年代初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陷入解体的原因之一。

与此对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农村的改革,之所以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对于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的自由支配权、以及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就使劳动者这一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应当说,这就是使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具体地贯彻到农民日常生活中去,实现社会主义同个人解放的同一性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这样,“西马”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可以成为我们总结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份值得借鉴和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

二、探索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 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设计的旗号下,抨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在系统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弄清楚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到底在哪里,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等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在 80 年代前期,在我国哲学界讨论哲学体系改革的时候,我就在《光明日